

自序

幾個月前，當我將這本散文集的一校稿帶回家時，我先生看到厚厚一疊，直說：「啊，很厚！」我說，這是二十年間的文章，不能說厚吧。

這裡收的文章最早的發表於一九八八年，正確來說已經是二十一年前的了。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只有這些可以寫嗎？當然不是，我的電腦裡存有很多散文檔案，有些起了頭，有些寫了快一半，不下二十篇，題目林林總總，但都遲遲不見進展，原因何在？簡單來說，就是欠缺時間，但深一層來說，是個人角色定位的問題。年過不惑後，我將研究和教學當成最重要的工作，寫散文只能在確實有餘裕時才寫，而研究和教學幾乎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有時打開電腦看著待完成的散文稿篇目，也常感到一種悵然，其中好幾篇構思很久，就只欠時間。

為了替這些文章找尋適合的插圖，我翻出二十多年來累積的照片，底片一張張看。這些影中人多數已經物故，這樣的感覺其實不是很好，好像在整理自己身後之物，違反常理提前做

什麼似的。我翻出幾張大頰鼠（hamster）的照片，耶魯大學研究所同學 Angela Yiu 要到日本做研究，提著大籠子來託我和我先生暫時照料他的寵物。我們很高興有這麼可愛的寵物作伴，每天除了餵食之外，很愛和牠玩，我替牠拍了照片留念。正回味大頰鼠的可愛時，我先生走過客廳，看一眼，說：「此物已不在人間。」啊，多麼冷靜且正確的敘述！

當然，在這些照片中也看到成長。親友的小孩，昔日的娃娃，現在都已經長大成人，是新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說不定此刻都忘了（或不想去想）他們曾經這麼可愛過——如果親子間正鬧不愉快的話。至於那些我在耶魯大學唸書時的大學生，現在也都是中年人了。我望著幾張耶魯舊照片，特別被耶魯學生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抗議活動所吸引。

我在耶魯大學就讀博士班時，南非問題很嚴重，一九八六年有一天在伍西大廳（Woolsey Hall）和苯內基善本書暨手稿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之間的廣場，突然出現違章小屋（shanty house），牆上大書標語，是大學生搭蓋的，堂而皇之抗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要求耶魯大學從該國撤資。在這裡，我有必要簡單說明一下。耶魯大學是私立學校，學校經費來源靠投資所得（如購買股票），當時

耶魯投資的一些公司在南非做生意，曼德拉還在囚禁中（自1662年起），政治衝突愈來愈嚴重，學生的訴求，除了要求南非政府釋放曼德拉、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外，還要求耶魯大學從南非撤資。耶魯大學校齡三百零八年，是和城市一起發展起來的，沒有很清楚的校園界線，馬路開過校園，自然不會有圍牆了。雖然如此，耶魯有很多大區塊校區，任你倘佯終日而不聞車馬喧。由於沒有圍牆，也就沒有「正門」，不過，大家似乎都將耶魯大學伍西大廳視為正門，該建築左廂為音樂廳，右廂二樓有校長廳（the President's Room，接待客人或其他公共功能，校長辦公室在它處）。訪客穿過伍西大廳的堂廳，就算進到耶魯校園了，眼前是個廣場，右前方有個像現代珠寶盒的大理石善本書圖書館建築，這裡可以說是耶魯大學的核心地區。學生抗議活動的違章小屋就搭建在這麼重要的地方！

這個象徵南非窮困的黑人在大城市搭蓋的簡陋小屋，維持二年以上，畢業典禮時成為紳士淑女穿梭駐足的一個景點。由於學生們具有足夠的人文和美學素養，整個場地一直相當乾淨整齊，既達到抗議的目的，又沒破壞耶魯大學引以為傲的美麗校景，反而產生一種奇特的現世的美學張力。當然，還是有人認為很煞風景（eyesore），還遭一位返校參加同學會的校友縱

火。

一九八七年春天鍾逸人先生訪問耶魯大學，我和我先生負責接待。鍾先生在二二八事件領導「二七部隊」，坐牢十七年，那是他出獄後第一次訪美，臺灣還在戒嚴時期，幾位學生和他見面談話，都是極隱密的。鍾逸人先生參觀耶魯大學校園時，抗議南非活動還在進行，他對違章小屋印象極為深刻，到現在還念念不忘，想寫入他的第三本回憶錄。

由於重看照片，這些意象顯得格外清晰。幸好當時拍了照片！有些照片，真的是忘了曾拍下。就讀耶魯時，我們寓居菩提街的小閣樓，當時房間牆上貼了一張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海報，若非看到照片，還真不記得貼在哪面牆，也不記得曾在海報前留影。只依稀記得搬離美國時，還將那張海報捲起來收著，但此刻已不知淹沒在哪堆舊物中了。

話說回來，有些事情，即使沒拍照片，沒留下影像紀錄，它還是隱然貫串著你的人生。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到師大公園參加「聲援翁山蘇姬 關注緬甸人權」活動，再度看到了「荊棘中的燭火」——國際特赦組織的標誌。二十多年前，在異國的我曾因這個標誌而感動不已，我也親眼見證耶魯的大學

生如何熱切討論救援我們的政治犯——而我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今天換我們來寫救援明信片，救援緬甸的政治犯，我感到我們社會的絕大進步，我們此刻的幸運；但是，望著風中的燭火，我還是有我的失望，我們的關心是否太淡薄了些？但願能看到更多的大學生。

年輕的我關心人權，這個關懷似乎仍在。此刻最讓我關心的兩位女士是翁山蘇姬和唯色。翁山蘇姬女士於一九八八年返國照顧生病的母親，參與緬甸的民主運動，一九九〇年他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大獲全勝，他理當成為緬甸的國家總理，但選舉結果卻被軍事政權硬生生以武力取消。此後十九年，他被軟禁無數次，共計十三年之久，其間還曾被關在惡名昭彰的「硬心」監獄（Insein Prison）。此次軟禁是否再度延長，甚至被關到監獄，都令人感到很無力。真想問世間，公理為何物？翁山蘇姬的父親是反殖民運動者，在從英國爭取到獨立之後，為政敵所暗殺。翁山蘇姬在殖民統治的「餘蔭」下成長，接受再良好不過的英國教育，嫁給英國教授，生有二子，自己也取得英國大學的博士學位，本可在海外過著平穩且充實的中產階級生活，但他選擇和緬甸的人民站在一起——這個選擇，我想常人做不到。翁山蘇姬將「後殖民」的遺產用來

試圖扭轉前殖民地的悲運，這點讓研究殖民地歷史的我，深有所感。世界是無情的，如果不是翁山蘇姬女士，我相信會有更少的人關心緬甸。這是她不願如軍政府之意離開緬甸的原因吧。

從我回國以來，臺大附近我最喜歡用餐的地方是一家滇緬餐廳，除了菜好，布置賞心悅目之外，牆上長久掛著一幅翁山蘇姬的畫像，也是原因之一。我沒問過店家何以掛這張畫像，但他們離開緬甸仍記掛著女士，讓我想起女士的籲求：「請用你的自由來促進我們的自由。」（Please use your liberty to promote ours.）

如果翁山蘇姬用他相當英化的文化資源來領導、支持緬甸的民主運動，那麼，有四分之一漢人血統的唯色則用他高度漢化的資源，在圖博（西藏）人爭取自由的悲慘奮鬥中，做出無可取代的貢獻。沒有唯色那絕佳的中文文筆，我們這些不懂藏文的人，對於西藏人的心靈世界、信教的虔誠，以及喪失語文文化的苦痛，終將隔好幾層。我想像，唯色女士若有幸到達蘭薩拉訪問，人們將為他鋪出一條灑滿花卉之路，尊者將用他那溫厚的雙手緊緊握住這個西藏女兒的手。

作為女性的我，特別關心翁山蘇姬女士和唯色女士。他們

以柔弱之姿，扛起家國的苦難，在他們美麗姣好的容顏中，我看到毅力和堅忍，看到追求理想的精神力量。翁山蘇姬女士大我十一歲，唯色女士小我十歲，能和他們生活在同個世紀，是幸運的；但是，我想，兩位女士更期望我們關心他們背後無數看不清面目的男男女女，那經不起槍桿子一打的微小生命。

寫了這麼許多，可要嚇跑可能的讀者。這本散文集其實沒那麼沈重，裡邊有我們這個世代的共同記憶。明星是我們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偶像，大概很多人都曾經迷過吧。現在奧黛麗赫本裝又流行回來，讓人有時光倒流之感。不久前，在電腦螢幕上觀看日本去年的電影《母親》(母べえ)，主角是吉永小百合，演戰爭期日本一位反戰知識分子的妻子。原先我的一位學生介紹給我時，我以為是舊片，看時發現是新片，碟片匣寫著二〇〇八年得甚麼獎的，心裡很納悶，吉永小姐不是應該已經六十歲了嗎？怎麼可能演三十出頭的少婦角色？上網一查，吉永小姐生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今年滿六十四歲，拍這部電影時，至少已經六十二、三了。如何可能？真是只有佩服了。演自己年齡折半的角色，還能讓觀眾信以為真，良哉，永遠的小百合！

散文集中有幾篇算是紀遊。我到過的地方其實不多，我的

一位好友，在國中任教，寒暑假必出國旅遊，他到過的國家是我的數倍吧。我在生活中，採取「鼴鼠哲學」。總覺得「鼴鼠過河，不過滿腹」，不貪多，凡事隨緣。我出國通常因為工作的關係，一九九四年返國後，最常去的國家是日本，最長待過半年，有很多的感想，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舉國」重視考古，考古發現是會上新聞頭版的，很特別。我個人「好古」，《奈良雪天二日記》是這樣的一個心情的紀錄。其實第二年（2005）春天，我有幸參加日本一個研究團隊的奈良之旅，外國成員來自臺灣、中國和韓國，其中有考古學家，我們參觀研究單位，並且訪問考古遺址，收穫豐碩，可惜還沒時間整理出來。

二〇〇五年附驥尾的考古之旅，最特別的是，剛好遇上奈良明日香的飛鳥京跡有重大的考古發現，就在報紙報導的那一天，我們訪問被認為是「飛鳥淨御原宮」的遺址，當時工作人員正在工作，我們手臂上帶著臂章，通過封鎖線，踏到遺址上去參觀，感到無比的興奮，甚至有一種幸福的感覺。這時遺址封鎖線外有群衆圍觀、拍照；我還記得一位繪製陶罐的年輕女孩，在烈日下很認真地一筆一劃將實物描繪到格子線上，他不知道已工作多少小時了。明年是平城遷都一千三百年紀念，一

位偶然認識的旅日臺灣女孩，同樣好古，已經去參觀過復建的大極殿內部，還寄來照片分享，明年大極殿應會正式揭幕（照片中還罩在工事的大帷幕中）。鼴鼠遐想盛況，若真想去，當是去得了，但人生到了一定階段，最想做的還是完成自己給自己編派的工作吧。

除了奈良，如果還有一個國外地方，我特別想再度拜訪，那就是愛爾蘭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臺灣反殖民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林獻堂先生開始他為期近一年的環球之旅。（親愛的年輕讀者，時代不同，當時搭船，光是交通就要花很多時間。）在日治時期，一般人能出臺灣島在日本帝國圈內旅遊都很不容易，遑論世界之旅，因此，就某個意義而言，林獻堂是替臺灣人出國見世面。他的《環球遊記》在《臺灣民報》連載四年又一個多月（1927/08/28-1931/10/03），八十年後讀來都非常有意思。林獻堂參觀英國倫敦海德公園，該公園以自由演說有名，星期天下午有十幾場演講會，林獻堂每到此散步，總要在兩枝旗下聽個十幾分鐘，一枝是印度人的三色旗，一枝是共產主義者的紅旗。前者是想了解印度人如何批評英國殖民統治，後者應該是想進一步了解共產主義。林獻堂開始環球之旅時，臺灣文化協會已分裂，為左派所掌控，作為地主，社會主

義思想應該很困擾他吧。林獻堂原先計畫訪問「愛爾蘭自由國」（林獻堂用語；英文為：the Irish Free State），卻因突然生病入療養院而無法成行。他在養病期間，請兒子攀龍讀新聞報導中的愛爾蘭消息，關注之情，充分流露。我之所以於二〇〇三年孟夏訪問都柏林，也算是續其餘意吧。

有時候，一個人離開故鄉，故鄉總好像沒離開過他。這本散文集，參雜很多外國事物，那是因為我二十五歲那年起，在美國和加拿大生活了十二年多，整整一紀有餘，我的智識上的養成基本上在這段時期——如果談得上有所養成的話。這裡記載了這段時期的忘年交，求學生涯岔出去的求藝小插曲，以及圖書館族自譜的圖書館頌歌。我的國外體驗，稱不上豐富多樣，只能說也許還有一些思考在裡頭。二〇〇三年，有一天我在研究室，吳叡人先生突然出現，他剛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送我，這個他口口聲聲稱為「sempai」（前輩）的我，一本他的英文博士論文。回家後，我打開一看，扉頁的題詞用英文寫著：「通過世界是回家的路」（Through the world was the way home）。這本集子有幾篇散文算是「通過世界後回家」的文章。但願此生不用再離開故鄉尋找回家的路。

前面提及我的電腦中存有很多篇待寫或還沒寫完的散文，

題目有「雨中的彌生坂」、「人間看展覽」、「江戶花語」、「再訪奈良」、「劍橋日記」、「蘋果的滋味」、「母親的長髮」、「活在花瓶黨的餘蔭底下」、「在傲慢與偏見中走一條學術小徑」……等。去年看了一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的日本戰前舊片《南進台灣》，對於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後，百年來幾乎都是被當成手段而存在，感觸很深，很想寫一本書，題目叫作「作為手段的臺灣」，探討這樣的統治方針及其塑造出來的集體心態對臺灣社會所造成的損害和斲傷。我自認為題目很好，於是跟我先生大談特談起來，還說日文就是「手段としての台湾」，我先生聽了，搬出吾家箴言說：「要寫就要好好寫，要寫得有深度。」這句話像是一帖清涼劑，讓我的腦筋頓時冷卻下來。我先生懂很多事情，包括世界時事，他拿這個標準要求自己，不隨便寫東西，因此不是特地潑我冷水。對於這本散文集，我只能說，我是「好好寫」，至於有沒有深度，不是自己可以說的，留待讀者來判斷了。

最後，我要感謝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先生，若沒有他的熱心協助，這本散文集大概出不來。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我們交換了不少和拙集沒有直接關係的看法，讓我深切感受到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好東西，只是我們不在意，不願花心思去澆灌

出一片好土壤，讓故園花卉得以開放。

白序

周婉窈 謹誌

二〇〇九年六月於龍坡里芬陀利室

史布格羅先生

圖書館游走紀思

面向過去而生

女性的命運

嬉波明星

域外藍鵲有夢思

——記我所認識的嘉疊師

懷哀思的永恆之城都柏林

奈良雪天二日記

緣起於江文也、緣起於曹永坤

高一生、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

——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運